

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理念与方法

朱国佳

【提要】在调查对象与目的方面，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充分体现了其真切关注现实大众生存状况的理念。审视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发展概况，亦可见其独特之处，即重视言必有据，心理历史溯源性较强，强调科际整合。

【关键词】台湾人类学 理念 文化 文化史 模式

【作者】朱国佳，女，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1)01-0032-06

台湾由于历史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人类学研究从1895年开始几乎没有中断过，并始终以田野调查为学科研究的基石。相比之下，大陆人类学研究的起点略晚于台湾，而且于50年代中后期直到80年代左右才有所恢复。受这种历史条件限制，大陆人类学显得相对滞后。一方面，大陆人类学研究虽然在近几年开始得到我国学术界更多的认同与重视，有一定的发展，但仍未能形成适合大陆本土具有共识性的人类学研究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对于人类学的学科涵义，我国的学术界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例如近几年涌现了许多冠以人类学头衔的学科：经济人类学、教育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人口人类学……等。虽然某些学科的建立具有其合理性，但是从某个角度而言，它也反映了一些学人对人类学的误解，把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体系直接等同于它的学科体系，从而使人类学面临泛化或消解于各个学科之间的危险。所以，我们除了对西方人类学理论进行系统的学习与研究并对本土文化反省外，还应对处于学术地理性边缘的有交融性的台湾人类学进行充分观照。而人类学研究以田野调查为学科的主要标志之一，因而本文力图对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念和方法进行一定的阐述和反思，以求对大陆人类学界的学术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关于田野调查理念的建构

台湾人类学研究始终对田野调查的重视可以说是其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而田野调查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必然要受先行文化理念所限制。当然，这种理念作为人类学家田野调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主体意识，是可变性与恒定性的矛盾统一。对于人类学家而言，田野操作甚至人类学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其时代、特定生活环境和特殊心态的烙印；对于整体的人类学研究而言，它具有一定的学科独立性，因此在动态的发展进程中必有自己恒定的内涵。正如李亦园先生所言：“其实人类学家并非真的是喜欢寂寞生涯，人类学家之所以乐于奔走于蛮荒之地，忍受土著的不耐与行政人员的讥讽，原也只是为了一种信念，一种遥远的理想在鞭策着他，就乔健兄在书中《漂泊中的永恒》一篇所描述瑶族人追寻他们的千家峒一样，人类学家只是在追寻他们对人类永恒本质的信念。”^①

因此，我们认为，台湾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也必然存在这样的理念，而且这个理念的建构过程较为曲折。一方面，这与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密切联系。因为在历史上台湾一直处于相对动荡的状态，使台湾多民族文化包含有它多层的意蕴，从而产生了对这种不稳定的文化融合过程认识的必

要。另一方面,台湾之所以产生这样相对稳定的田野调查理念,是因为日据时期对日本田野作业的研究方式之潜移,20、30年代对北大歌谣征集的田野采风之继承,60、70年代直接受英美传统的异文化、风俗之调查所影响。日据时期为了满足日本政府在台推行殖民政策的需要,鸟居龙藏、森丑之助、伊能嘉矩等许多日本学者对台湾各族体质、语言、历史、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生计类型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调查,^②保存了一定的珍贵资料。此时围绕台北大学“土俗人种学及语言学研究室”注意田野工作的文化史学范式开始形成。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随行学者李济、董作宾、芮逸夫、石璋如、陈绍馨、林衡立、陈其禄等一批在大陆已有田野采风思想的学者,调查台中县仁爱乡力行村瑞岩泰雅族,凌纯声、何联奎、卫惠林、杨希牧、董同和也加入并分别进行调查。尽管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初期,对文化发展进行严密控制。“只要书籍报刊的内容稍不利于国民党的统治,不管是否在八条禁书标准之列,一律查禁。”^③由此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偏向于考古学研究而漠视现实社会的研究,但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念却一直得以坚持并发展。当然,1955年以后台湾政局趋向稳定,对文化的限制相对宽容,并送一批学生出国留学。部分留学学者不但继承了中华主流文化的传统,而且受到英美系统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教育,因而对台湾原有人类学研究理论建构和田野调查的价值取向进行一定的反省。

以上只是对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发展作了纵向的表层论述。实际上,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还包含有十分丰富而深层的内蕴,受历史影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日据时期其目的是为了推行殖民政策,研究范围是殖民地区,研究对象是“异文化”(相对于日本学者而言),主要为日本政府服务。国民党退守初期目的是为了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品格,客观上却可巩固政府的统治,研究范围为台湾地区,研究对象主要是高山族——有九个支系的少数民族。60年代台湾统治相对稳定时,以功能学派为主,逐渐向服务于现实转变。1980年12月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举行“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1983年港台学术界再次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讨论会,并专门讨论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问题,从而标志了台湾人类学学术界研究的主向转入了汉族社会中的闽南人,即主流社会的深层研究。这一转变说明了原有西方的异文化视角的各种人类学理论难以直接用于台湾社会现实的研究,而必须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和创新。因此,直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类学界(包括香港、台湾、大陆),仍然十分关注本土化命题。由此而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人类学应该研究什么?田野调查由此而应调查什么?这种研究以及这种调查有什么价值?

1. 田野调查的对象

从学科内在的必然联系而言,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开展田野调查的依据之一,因此,确定了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同时也对田野调查的对象提出规定性的要求。一般认为,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本文所述的人类学指的是文化人类学,即如童恩正先生所言是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比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的文化的相同之点和相异之处,藉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④只不过,童先生只重视了文化人类学的动态变迁、整体观念、跨文化研究的特征,而忽视了田野调查、实证研究也是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不可或缺的一个特征。由此看来,文化人类学(本文皆简称为人类学,除非有特别注明)研究的对象即文化现象。所以,关于“文化”概念的界定至关重要。早期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也作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论,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⑤另外其它的人类学家或学者也对“文化”作了许多界定,在此不再赘述。

其实,尽管前人对“文化”进行充分论述,但是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人们潜在的生活观念不断变化,这种大而泛的界定给田野调查者带来某种程度的迷茫。在此背景下,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对“文化”又作一系列论述,并形成了一定的理念体系。在《人类的视野》中,李先生认为:“对于人类学家而言,所谓‘文化’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层次与意义。首先,文化可以分成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文化两个部分。也就是说文化一方面它可以存在于最具体的日常食衣住行与科技的物质层

面；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表现在较抽象的伦理道德或信仰艺术之中，同时，它更可以归结为行为底层的逻辑思维结构。”^⑥何星亮先生对其文化观和文化理论进行一定研究后认为，与这种文化观相对应，李先生提出了根据中国的材料与特点创立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自成一体，较为完善的“三次均衡和谐”理论模式，即自然系统的和谐、个体系统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⑦其实，何先生是在世纪之交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进而对李亦园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这个角度的反思。由于现代主义文明给人们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命危机、人性摧残、精神崩溃、人际疏远等负面影响，以寻求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和谐为内涵，提倡人作为大自然的成员存在而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存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后现代思潮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所以，现代主义文明影响下带来的种种问题和所取得的成果，也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亦成为田野调查的对象。正如吴燕和先生所述：“人类学的研究应对目前中国社会，甚至全世界最关注的焦点问题有直接贡献。”^⑧人类学研究以及田野调查的对象已不再限于边远的少数民族或相对落后的国家、民族，故台湾学者刘还月先生建议现代的田野工作者：“从我们身边熟悉的东西着手，而且不必忌讳别人经常报导的东西。”^⑨

总而言之，随着人类学研究的文化的外延拓展，田野调查的对象也拥有更广阔的选择空间。

2. 田野调查的目的

目前，台湾人类学者对田野调查研究的目的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人类学研究应有纯学术的价值取向，充分运用并建构文化理论，注重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与政府的政策、政治的操作无关；另一种意见认为应研究社会所关注的问题，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和管理，为政府机关的政策提供充分的现实材料与合理的建议，为老百姓谋利益。前者以庄英章为代表，如以北埔姜家为例，通过对其帐簿资料的研究，认为姜家中的壮丁在壮年时骤然早逝，日据殖民时期无法将传统资产“土地”转换成“资金”，给殖民政府交纳税收过多，是其经济负担沉重的原因。^⑩这一结论显然无太大现实意义。后者以李亦园的研究为代表，在吸收西方人类学理论的长处，进行本土化理论建构的同时更强调价值中心与历史联系，李先生的这种价值取向在他的研究中随处可见，故而不必详细说明。

以上两种意见表面似乎冲突。其实，根据文化发展经验可引申出这样的假设：在面临根本性冲突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整合现象，即双方冲突的过程其实也是互相认证的过程。因此，我们认为，第一种意见漠视现实问题固不足取，但其理论建构的主张对于人类学学科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第二种意见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但过分强调也易于忽视高层次学术品位的建构。当然，这并非简单的折中主义。从部分台湾人类学家做学问的历程可得一种宽容的理解：50年代李亦园先生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上学时，同班同学仅有唐美君先生一人，稍晚一点的乔健先生则是一人为一班。应该说，其时人类学研究偏离社会主流，现实功利性极淡，以致于学科研究的现实存在陷于险境；近几年人类学研究范式转轨，关注现实，研究者众而逐渐热门，但只能认为对原有体系进行超越是其发展过程的一个新阶段，而不能否定50年代人类学研究的奠基意义。因此，台湾人类学研究发展历程暗示了这样的解决方案：在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结合点，而不是简单地强求二者“以和为贵”。

客观地说，由于人为现实的存在，故进行人类学研究和田野调查时，有远见目光，不排斥某些纯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应提倡关注现实，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而注重人类学研究现实意义的同时，应力图超越原有范式，构建更具普遍性与贡献性的理论体系。这种学术研究的趋势在台湾人类学界已得到普遍认可，并取得一定成就。如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自1970年开始，“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探讨”。^⑪而最近即1999年3、4月份台湾法鼓山的圣严法师组织了“人文关怀与社会实践”系列研讨会，建议“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并倡导心灵环保、礼仪环保、生活环保、自然环保。它充分体现了关注民生的情怀与学术发展方向。

因此，台湾人类学的现代研究导向表明：关注现实大众的实际生存状况，探求人类如何在与自然、与自我、与社会和谐的同时更全面、更合理地发展自己，正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目的所在。

二、关于田野调查的方法

与其理念相对应,台湾田野调查的方法也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善到相对成熟的过程,而且具有一定特点,并很值得借鉴。

在日据时期,受先行理念左右,日本学者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即使不全也是主要是为了达到认识台湾,从而更好地推行殖民政策。故而其调查方法正如张海洋先生所述,“日本人从异文化角度调查台湾民俗,采用技术为准民族学式,其记录详实且巨细无遗,包括人口普查、体质特征、生态环境、风俗习惯、社会组织以及宗教体系等等方面,具有很高参考性价值。”^⑩而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以后,虽不再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异文化视角,但由于仍主要以汉民族作为参照体系,研究台湾土著民族,强调异民族文化视角;故而其调查方法未有实质性变革。这主要表现在其田野作业注重考古学方式操作,即田野调查注重标本的采集与收藏,并成立相应的标本室。而且,注重民族历史文化的调查,从而其田野调查过程中文献资料的利用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这时田野调查的介入点仍是关于边缘性民族的文化历时性材料积累,在方法上未有更多的突破性发展。

而6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有所改观。当然,这种改观与其理念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张海洋先生认为,理念变革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社会认知场域变化。^⑪为此他采用一种典型的由上层建筑变革转而向经济基础、社会因素方面找原因的分析模式,这也是大多数学者都认同的思维方法,而且也确实值得推崇和赞誉。然而,总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未必是学术研究的幸事,而应超越原有模式,以求更深入认识。

如前文所述,60年代后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转入对主流社会的研究,注重对“中国化”问题的研究。这种转变以功能学派理论的应用为前提。因此,除了张先生在其文中所论及的几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它具有独立性,有自己一定的变革规律。1895年以来,台湾人类学研究长期以文化史、民族史范式为主、以致于其资料的积累达到了一定程度,虽然可体现此范式的丰功伟绩,但同时也体现了它向僵化与刻板方向发展的趋势。同理,与这种范式相关,作为田野调查的方法更具自主性。原有田野调查方法注重文化与民族史建构,因而强调对具体研究对象的科学考证,并对其细节详实而准确地记录。这种方法的层次性决定了它必被超越和取代的前途。而到了60年代,采用这种方法而积累的学术资料已大体呈现了同向性、单向性的不平衡态势,若不进行变革,必然导致这一方法的消极灭亡。而此时由西方引入的功能学派理论又成为这种变革的最佳契机。毕竟,功能学派理论的文本色彩较淡,即其适用的情景限制较少。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认为,“功能论这种研究工具,是从事于田野工作和比较分析不同文化种种现象所必须具备的。”^⑫故而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为台湾人类学者所用。而且,功能学派理论是对历史学派理论与方法横向的超越与深化,适应现代社会思维方式由线性向网络性结构转变的需要,并易于为台湾人类学者所释解。

而今在西方各理论流派的影响以及力图不失本色的矛盾冲突与整合下,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逐步形成一些特征,主要表现在:

首先,重视微观实证的方法,有准确细致的调查记录,讲求“言必有据”的传统。这一特点在刘还月先生的《台湾民俗田野行动入门》一书中有明显体现。一方面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强调充分的行前准备,以期顺利获得详细无误的第一手资料。例如强调行前硬件要准备笔、笔记本、相机、录音机、地图、指南针、手电筒以及其他个人所需的小装备等。同时还提出行前背景材料的准备,“地方志书、旅游指南、游戏回忆、古书、地方社团的专刊、期刊、地方报纸、写实小说、回忆录、地方人物传记、地理杂谈、地方性的杂志,以及地方文献、宗庙简介……等等,都是最好的基本资料来源。”^⑬其调查的细致性可由此略见一斑。相对于某些大陆学者仅重宽泛的文本概念而无多种实证基础的关于某一民族性一般化探讨,体现了一种反差。另一方面,强调田野调查者做好资料采集中的完整记录。为此,观察过程中善用身体的感官,事先记录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完整记录活动
万方数据

现场的主、配件甚至时间。访问过程中，无论成功与失败，都应该留下基本的记录……这些基本资料，除了可以佐证资料的真实性，更是人力资料库中的重要资源。^⑩这种具体的操作技术其实传递这样的信息：台湾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仍体现其史学传统的实证烙印，但又有所突破，即趋向主客位研究，不但重视他者的感受与所提供的信息，也强调自我感受与实际所观察的信息。

而随着人类学研究的深入，对田野调查方法的改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近几年一些研究者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结果的准确性与科学性进行了反省。^⑪为此，香港人类学家吴燕和先生提出了让当事人百家争鸣，多重反复对话的多义文化描叙，使田野调查的方法更进一步，人类学研究的准确性相对提高。但如上所述，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并未提出明显的新专门术语，因此相对而言在方法上似乎未有很大贡献。而且，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在其文章的注释中就曾提及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认为台湾人类学是一种繁琐的模式。他们只是报告说这个庙里有多少的神祇，有多少人去了庙里，他们在市场上买了什么东西……大多数台湾人类学家实际上只在搞初级的民族志，而不是民族学。^⑫很显然，这种评价是带有偏见的。但反思之余，我们认为，这种片面和夸大的见解也并非无任何依据。相对于西方人类学已有理论成果而言，台湾人类学研究理论的构建确实有差距。而且田野调查中过于强调微观材料的积累，追求细节的精确化，忽视田野调查的真正目的，为调查而调查，使得学术研究缺乏远见视野。

但纵观台湾以及大陆的社会现实，结合世纪之交的时代背景，人类学家不能只是躲在书斋中忙于纯理论研究，而必须关注社会现实的状况和广大民众的喜怒哀乐。为达此目的，人类学家必须对瞬息万变的社会变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而这种敏感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田野调查过程微观的第一手材料。

因此，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这种特点，适应于中国人类学注重自我应用研究的需要，与西方人类学研究视角有所差别，而这种差别正是台湾人类学在广泛吸收西方先进理论的基础上既发展自己又不迷失自我的保证。

其次，田野调查过程中的心理历史溯源性较强，而且越来越重视对现实的研究，这与台湾特殊的历史以及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作为深受海洋影响的海岛，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移民现象最为突出，而且移民的来源又各不相同，并长期受西方文化直接影响，这种转折所产生的心理冲突，使得本土文化具有某种神秘性。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台湾民间信仰以及宇宙建筑在人们生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为此，田野调查必须首先做好基本的阐释工作，而这种阐释必然要追溯渊源。刘还月先生在其《台湾民俗田野行动入门》一书首先就对台湾的历史材料进行整体梳理与介绍。例如分荷西时期、明郑时期、清朝时期、日本时代初期、日本时代末期至国民政府时期等阶段列举相应的史料，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便利。

当然，在台湾人类学研究成果中，此特点亦有充分体现。如李亦园先生 96 年提交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论文反映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民间信仰和地方宗教活动的转变，“并从历史传统的脉络中，介绍中国文化里人与神界之相通和转换的有趣过程。”而在其他不少台湾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中亦具这些特点。而大陆人类学真正从文化意义的深层内蕴去调查研究并不多见。正是由于忽视这方面的调查，因而也较少在相应适当的方面加强人们信仰结构的建设，从而造成了精神家园某种程度上的空白，因而可能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故而值得大陆学人深思。

再次，其调查强调科际整合，体现了方法运用的独立性。自 1970 年开始，台湾民族学研究所设三个研究组，其中的行为组以行为科学科际整合方法研究人类文化及其行为，涉及学科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医学等。明显受西方有关的理论与方法影响，同时也表明了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创新探索的一种尝试，并力图超越原有民族志方式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与思维方式，达成更深入准确的共识，从而为现实社会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人类学研究在这一尝试中始终坚守其本位的学科主旨：尽管借鉴他人成果，但创出“新我”而非同化为“他我”。

经过对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理念与方法的了解(主要为其优势方面,因目的为借鉴之需),对于未来人类学的发展,可获一些启示:

第一,台湾人类学研究不仅处于地理性边缘,而且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其学术研究也处于边缘,故受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并整合不可避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视为大陆人类学研究的目标,预示学科发展的最佳方向。

第二,台湾人类学与大陆人类学皆重视纵向的田野资料积累,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它相对于文化发展的动态性必然滞后。欲谋求新的发展,在微观实证的田野基础上,必须把研究的视点更多地转到与横向的理论建构结合,从而对社会发展的未来形成先见之明,使学科的发展更具现实合理性。

第三,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念与方法的不断更新与进步表明,随着新时代新发展的到来,人类学研究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不但从边缘性对象转入对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的研究,而且越来越强调田野工作者应肩负这种责任:不仅关注本族群本国的发展,而且关注全人类的生存与进步,并且以宽容的胸怀为之做出切实贡献。

第四,同时还表明了人类学研究总是在实践中不断超越和发展。唯有加强对现实的调查研究,才有多层次多角度地超越,人类学研究才会更有蓬勃生机。

注释:

- ①⑥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第46、10页。
- ②⑫张海洋:《1949年以来的台湾民族学》(上),《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第35页。
- ⑪⑬张海洋:《1949年以来的台湾民族学》(中),《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
- ③茅家琦:《台湾三十年》(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9页。
- ④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⑤⑭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第9、119页。
- ⑦何星亮:《李亦园的文化观与文化理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7月,第9至11页。
- ⑧吴燕和:《跨越东西方的香港人类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春季卷,第8页。
- ⑨⑮⑯刘还月:《台湾民俗田野行动入门》,台北市,常民文化出版,1999年3月,第1版,第98、102至103、114页。
- ⑩庄英章、连瑞枝:《从帐簿资料看日据北台湾乡绅家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以北埔姜家为例》,《汉学研究》第16卷第2期,汉学研究中心,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出版,中华民国87年12月,第79页;庄英章先生类似文章仍有如《福建惠东妇女文化丛初探》(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49期油印本,中华民国82年12月出版),也只是停留在伴随长住娘家婚俗所引申出来的一连串文化现象。
- ⑰潘绥铭:《社会调查,何谓真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秋季卷),以及王清钢、潘守永:《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2期,第13页。
- ⑱〔美〕顾定国/著,胡鸿保、周燕/译:《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眼里的“人类学中国化”》,《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10月,第10页。

〔责任编辑:邵志忠〕

作者: [朱国佳](#)
作者单位: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刊名: [广西民族研究](#) PKU CSSCI
英文刊名: [STUDY OF ETHNICS IN GUANGXI](#)
年, 卷(期): 2001(1)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11条)

1. [李亦园](#) [人类的视野](#) 1996
2. [张海洋](#) [〈1949年以来的台湾民族学〉\(上\)](#) 1999(02)
3. [茅家琦](#) [〈台湾三十年〉\(1949--1979\)](#) 1988
4. [童恩正](#) [文化人类学](#) 1989
5. [黄淑娉](#); [龚佩华](#)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1996
6. [何星亮](#) [李亦园的文化观与文化理论](#) 1999
7. [吴燕和](#) [跨越东西方的香港人类学](#) 1996
8. [刘还月](#) [〈台湾民俗田野行动入门〉第1版](#) 1999
9. [张海洋](#) [〈1949年以来的台湾民族学〉\(中\)](#) 1999(03)
10. [潘绥铭](#) [社会调查, 何谓真实?](#) 1996
11. [顾定国](#); [胡鸿保](#); [周燕](#) [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眼里的“人类学中国化”](#) 1999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1. [何星亮](#) [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与未来](#)[期刊论文]-[民族研究](#)2002(5)
2. [傲东](#) [参与观察、类型比较和文化变迁的经验基础--评费孝通与利奇之间的理论分歧](#)[期刊论文]-[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2, 13(1)
3. [森正夫](#) [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以中国史研究为中心](#)[期刊论文]-[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32(3)
4. [左玉河](#), [Zuo Yuhe](#) [热点透视与学科建设: 近年来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期刊论文]-[中华文化论坛](#)2011(1)
5. [聂蒲生](#), [Nie Pusheng](#) [抗战时期吴泽霖教授对云南丽江么些人的田野调查研究](#)[期刊论文]-[广西民族研究](#)2007(4)
6. [杨源](#), [Yangyuan](#) [来自田野的报告——民族田野调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期刊论文]-[中国博物馆](#)2006(4)
7. [龚世扬](#) [关于民族文物征集的几点思考](#)[期刊论文]-[南方论刊](#)2010(4)
8. [祁庆富](#) [民族学调查应引进社会学抽样调查方法](#)[期刊论文]-[民族研究](#)2002(5)
9. [彭芳胜](#), [田华咏](#), [滕建卓](#), [潘永华](#), [王菊满](#) [土家医雷火神针治疗风湿病技术规范研究](#)[期刊论文]-[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1, 17(4)
10. [石毅](#) [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期刊论文]-[广西民族研究](#)2002(3)

引证文献(1条)

1. [陈兴贵](#) [全球化与地方化语境下的中国人类学本土化](#)[期刊论文]-[贺州学院学报](#) 2009(4)

引用本文格式: [朱国佳](#) [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理念与方法](#)[期刊论文]-[广西民族研究](#) 2001(1)